

共匪「大字報」的綜合研究

·上·

汪學文

共匪「解放軍報」於五十五年六月六日發表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指出：「一小撮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長時期以來，却用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對抗毛主席的光輝思想。」「他們把某些部門、某些報刊的領導權篡奪了過去，放手讓一切牛鬼蛇神出籠，拒不執行黨的方針。」而所謂「某些報刊」，竟包括匪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內。在共匪歷次整肅運動中，「人民日報」總是帶頭叫罵，而在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僅表現得不積極，而且備受「解放軍報」的攻擊。

五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姚匪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展開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戰，其戰場不在「人民日報」，而是在上海「文匯報」。十一月十九日，匪「解放軍報」首先轉載這篇文章，並加編者按語，肯定「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及五月四日，「解放軍報」又兩度發表社論，表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氣焰高張，取代「黨報」之領導地位。此時，在清算「海瑞罷官」與「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光明日報」、「北京大公報」、「工人日報」，以及匪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的態度，均同「人民日報」一致，而與「解放軍報」對立。因此在五、六月間，毛匪對這些報刊先後予以整肅奪權。後來甚至將「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北京大公報」等予以停刊處分。

而「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等經整肅之後，除經常轉載「紅旗」雜誌及「解放軍報」之社論外，則僅日復一日地報導各地區、各單位、以及某些「積極份子」等如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或者點名批判某人為「三反份子」、某人為「反動學術權威」而已，消息來源幾乎完全枯竭。依照匪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十一條的規定：「在報刊上點名批

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因而被點名批判的僅是若干代表性人物，數量並不多；但是「大字報」却不受此限制，可以隨意批判和攻擊任何人，也可以大量刊登似是而非，或真或假的「簡訊」，於是「消息靈通」、「內容豐富」，格外顯得「多采多姿」，不僅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環，而且成為各國記者，特別是日本記者採訪大陸新聞的主要對象。不過，由於「大字報」的變化無窮，背景複雜，外籍記者為其所發出的報導雖「極為生動」，但內容却極為混亂，或有頭無尾，或前後矛盾，讀來令人莫衷一是，頗覺迷惑。其實，「大字報」本身就是一個「謎」，因而它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

一、「大字報」的性質與作用

共匪在延安時期就會使用「大字報」，而在四六年「大鳴大放」時期，「大字報」特別活躍，成為知識份子反共的有力武器。四十七年「大躍進」時期，「大字報」一度被共匪用來鼓勵生產。因此，所謂「大字報」，乃是指導工廠作業班、農場田間、學校課堂，以及街頭巷尾的「壁報」、「海報」、「黑板報」等而言。

在共匪「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則成為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的手段。

在共匪「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約有下列諸特性：

(一)「大字報」是「戰鬥號令」 五十五年六月一日毛匪決定在廣播電台和報紙上發表「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十月二十五日毛匪在匪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最近幾個月來我會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發表過幾篇文章，黨中央也會在五月十六日發出過通知，但未能

引起大家的注意，結果由大字報收到了效果。要受紅衛兵猛烈的攻擊，大家才會注意。等到鬥爭已臨到自己的頭上才注意。」因此，共匪指毛會決定發表「第一張大字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直接發出的戰鬥號令」，「它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羣衆，自下而上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羣衆運動，揭露和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陰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註一）

(II) 「大字報」是「鬥爭武器」 毛匪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註二），「紅旗」雜誌的評論員亦指出：「大字報，是小將們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進攻的有力武器。他們的大字報，如利劍，如匕首，擊中了敵人的要害，刺傷了敵人的痛處，長了革命者的志氣，滅了敵人的威風。」（註三）

「大字報」與「紅衛兵」同為毛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使用的「鬥爭武器」。五十五年八月一日毛曾在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說：「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註四）由此可知毛會之所以支持「紅衛兵」、運用「紅衛兵」，其主要媒介之一可能就是「大字報」。「紅衛兵」用「大字報」作為「鬥爭武器」，毛匪澤東則同時利用「紅衛兵」和「大字報」作為「鬥爭武器」，一打一罵，一個「武門」，一個「文門」，相互配合。

(III) 「大字報」是「照妖鏡」

五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共匪「人民日報」的社論說：「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

你一張，我一張，從各個方面，一下子就讓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露出了真面貌。」其實，「大字報」不僅揭露了「黑幫」的真面貌，同時也暴露了匪黨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真象，如派系的複雜，路線的衝突，以及匪幹

的專橫箝制等，因此，對整個匪黨和匪幹而言，「大字報」也是一面大的「照妖鏡。」

(IV) 「大字報」是「護身符」

共匪在歷次整風運動中，均以

「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鬥爭的手段，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大字報」遂亦成為「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場所。共匪「解放日報」五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的社論指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僅是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的武器，也是監督當權的同志，防止修正主義產生和滋長的武器。有些單位在奪權後，大字報零零落落，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接着，該社論強調要「運用四大武器，監督和幫助當權的同志」；而「當權的同志」應「虛心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最近投奔自由的音樂家馬思聰，會現身說法地提到一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實例，他說：「六月初（五十五年）我獲得消息說，在音樂學院已貼有攻擊我的大字報。這種大字報便是『偉大的文化革命』的品質證明書。這種大字報書寫在報紙或各種雜紙上，上面載有消息、指控、認過、公告或對毛澤東的讚揚。一位朋友建議，我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情勢更糟以前，寫一篇白書，自我檢討。我太太和我女兒瑞雪均表同意。而我仍感到猶豫，因為我無可檢討，同時我不喜歡這種公開自我檢討的主張，最後我女兒為我寫了一篇聲明。這一聲明說，我熱忱的支持文化革命，並且我願意接受改造，雖然我未承認有任何特別的過失。我們買了三張黃紙，將這項聲明寫在大字報上，標題是『我的決心』。我把它拿到音樂學院。」（註五）從這一實例中，我們知道「大字報」可以用作「批評」的場所，批評別人往往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精神或立場」，為了「自衛」；也可以用作「自我批評」的場所，自我檢討則係為了「過關」，為了「自保」。因此，從「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觀點來看，「大字報」乃是一種「護身符」。

由上可知，「大字報」具有多種多樣的特性與作用，可以用以攻擊別人，也可用以防衛自己，因而擁毛派利用它，反毛派也利用它；也因而如雨後春筍，大量湧出，遍及整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

二 「第一張大字報」

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所寫的題爲「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六月一日經毛匪決定，在廣播電台及報紙上發表。

這張「大字報」，據聶元梓說：「我們的大字報就是在『通知』的鼓舞下誕生的。沒有『通知』，就沒有我們的大字報。」（註六）所謂「通知」，係指匪黨中央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爲這個「通知」點名批判了偽北京市長彭真，所以聶元梓等才敢指責偽北京大學校長陸平等「破壞文化革命」。

據毛匪澤東在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匪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使大家發生困擾的文化革命，先是我命令北大的聶元梓女士寫大字報，批評陸平校長（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又直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們，要他們寫大字報砲轟『劉鄧司令部』（八月十一中全會期間），以上這些才是最近（一九六六年六至十月不足五個月）的事。」

而據僞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負責人蒯大富五十六年二月五日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楊克明寫的。」（註七）這張「大字報」原署名者共七人，其中聶元梓等六人後來曾在「人民日報」發表「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戰鬥的號角」（五月十九日）、「大海航行靠舵手」（六月一日）等文，獨少楊克明一人，足見此七人已發生內鬭。因爲計有以上三說，這張「大字報」究竟係何人所寫？爲何而寫？仍然是個「謎」，暫難確定。

五十五年八月五日，毛匪在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曾發表一篇題爲「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毛匪稱之爲「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五十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始透露其原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志，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

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省）的嗎？」

這篇「第一張毛澤東的大字報」，雖然題爲「炮打司令部」，實際上仍是以推薦「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爲主。今年八月五日匪「人民日報」尚發表題爲「砲打資產階級司令部」之社論，以紀念其發表一週年。

五十六年一月四日，匪僞「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十一個單位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響應「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這篇文章亦係經毛酋批准而發表，所以「紅衛兵」稱之爲「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註八）

三 「大字報」的形式

「大字報」的形式，大約可分爲六種：

第一種，是以大字書寫的標語口號，如「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等是。這種「大字報」內容簡單，但是非常醒目。

第二種，是以大字書寫的高級匪幹言論或反毛派重要罪狀，例如報導周匪恩來一月十二日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的演說內容，寫在和報紙大小相仿的紙上，冠以很大的標題，因爲是長篇大論，全文將近五十張紙。又如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匪「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所張貼的列舉劉少奇十大罪狀的「大字報」，約有一萬五千字，用四十三張大紙張書寫。紙張因爲過薄，假如不早去看，會被風吹得七零八落，讀不成了。

第三種，是鉛印或油印的資料，這些資料有的是專刊小冊，有的是「紅衛兵」報紙，本是分發給各組織內部參考的，但也在街上一頁一頁的貼起來。這類資料由於字小，而牆壁又凹凸不平，往往充滿了破洞而難于閱讀。

第四種，紙張有人那麼高，標題是印就的。開頭有套紅的「最高指示」字樣，接着來一段「毛主席語錄」，以下則書寫自己的提議或批判，不讀到最後就把握不到內容要旨，不會知道它在講些什麼。本年一月間，這種形式的「大字報」特別多。

第五種，是油印的傳單。普通都是從「紅衛兵」或「革命工人」的宣傳車上散發下來。這種傳單貼在牆壁上就成爲「大字報」了。

第六種，是漫畫。這些漫畫都是諷刺地描繪遭受攻擊的匪幹的，例如劉

少奇和黑魯曉夫擁抱的嘴臉，以及王光美和蘇卡諾跳舞的姿態等是。北平二十多個大專院校，以及一些工廠、機關的「革命造反派」於二月五日曾在「天文館」舉辦「砸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漫畫展覽」，參加這次展覽的大部份作品都曾經在「大字報」上發表過，因而又稱之為「大字報漫畫展覽」。（註九）

以上第一種、第二種、以及第四種，乃是「大字報」的正宗，其餘各種則為「大字報」的變體。而第三種和第五種的字體都很小，因而實際上只是「小字報」。據說陸平認為「北大不宜貼大字報」，主張「開小組會，寫小字報」（註一〇），足見另有「小字報」一種；最近共匪覺得「大字報」比較浪費，為節約紙張，於是又提倡所謂「小字報」（註一一）。因而今後「小字報」或將取「大字報」而代之。

四 「大字報」的內容

「大字報」的內容，一般說來，大約有下列諸項：

(一) 所謂「最高指示」，即「毛澤東語錄」。

(二) 轉載「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之社論及重要報導。

(三) 新聞簡報或參考消息。

(五) 「紅衛兵」的通令。如匪「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總部」五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的「通令」第三條即規定：「在外兵團戰士或聯絡站接到通令後，必須用大字報等方式進行宣傳，並用各種方式通知其他人員。」（按：該項通令係要求該校在外串聯之「紅衛兵」一律限期返校。）

(六) 對反毛份子的揭露、聲討、和控訴。其中包括若干調查資料。

(七) 自白書、自我檢查、自我批評。

(八) 對毛派頭幹的歌「功」頌「德」。匪「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五十六年六月七日「關於認真轉變作風的若干規定」的第一條即規定：「禁止給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歌功頌德，禁止貼恭維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大字報和大字標語。已經貼出的，要說服羣衆迅速覆蓋。」從這一條規定，我們不難看出：在毛派中歌「功」頌「德」之風很盛。

「大字報」的張貼，真是無孔不入，到處都是，特別是各重要城市，已形成為「大字報海洋」。茲舉其主要張貼地點如下：

(一) 街道的每一角落，如牆壁、商店櫥窗、路燈柱子、路旁樹幹等都貼滿「大字報」。

(二) 學校的每一角落，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大字報」是貼在北京大學的飯廳裏，當時陸平曾向這張「大字報」反擊，六月一日在廣播及報刊發表後始得到支持。反擊和支持的主要方法就是貼「大字報」，因此北大很快就貼滿了「大字報」。據說「中山大學」貼的「大字報」也很多，「這些觸目驚心的清算大字報，由於都是貼在臨時特製的竹木架上，加上長達兩三里，因此，都有如新築的黑色長城一樣，不但把以幽美出名的康樂園景色，破壞無遺，而且更造成一種恐怖。」（註一二）

(三) 會場，毛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就是貼在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場。

(四) 家庭，陳匪伯達一度下令禁止「貼劉少奇大字報」，因而江匪青要把「大字報」貼到劉少奇家裏去。在一個會上，江匪青指使戚匪本禹對「紅衛兵」作了一項指示：「劉濤（劉少奇之女）揭發她老子的大字報可貼到中南海，讓能進中南海的高幹子弟，讓劉濤他們去貼，抄好的大字報，貼在外邊他們看不到，貼到他家裏去，讓他看。」（註一三）匪偽「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攻擊馬思聰的「大字報」，不僅貼在學校裏，也貼滿了他家裏的每一個地方。

(五) 身上，「紅衛兵」攻擊馬思聰的「大字報」，有的甚至貼到他的身上，馬思聰說：「有一天晚上，從各學校和單位來了許多卡車到『音樂學院』，其中一輛寫着『黑幫專車』四個字，……那是八月九日的事，……我的腳還剛踏到院子裏，便有人將一桶漿糊倒在我的頭上，其他的人將大字報貼在我的身上，並將一頂小丑的高帽子套在我的頭上，上有『牛鬼』兩個字，……這是一場狂暴的鏡頭。」（註一四）

(六) 地上，「大字報」無處可貼時，乾脆放在地上，拿磚石一鎮，以「馬路新聞」的姿態出現。據路透社三月十一日報導說：北平車站的牆壁，

由墨西哥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對於工業化的發展愈發積極來看，墨西哥是善於利用國際間的「衝突」來增加他國家的財富。而現在墨西哥是否又在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來達成他所期望的高度工業化目的？

我們雖然還不能確定這就是墨西哥走向國際「第三勢力」的真正理由，但我們就整個拉丁美洲來觀察，在已故甘迺迪總統倡導的「進步聯盟」計劃，迄今並沒有發生預期效果，而後美國又缺乏適當政策，使得拉丁美洲國家對於法國戴高樂總統的「新世界觀念」以及「第三勢力」的政策已經發生好感。所以除了墨西哥之外，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亦都有朝向西歐發展的意向。

再就法國方面來看，法國能否以大量金錢或優良技術來協助墨西哥？法國有多少軍事力量來保護墨西哥不受共黨的威脅？這些在法國來說都是難以實現的。單就經濟方面看，法國終難代替美國，因為美國在墨西哥的投資，現在每年已超出十億美元。在貿易方面法國更難追上美國，一九六六年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已接近十億美元，但對法國的出口却不足五千萬美元。何況美、墨兩國由於地理上所形成的鏈鎖經濟關係是無法分離的。

最後我們認為，墨西哥過份重視工業開發的結果，固然可使他成為現代化的工業國家，但是在其工業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態下，國民經濟必然受到影響。例如墨西哥由於工業發展的負擔，已使得農業及一般生產與消費工業方面如電氣工業、食品工業、紡織工業以及化學工業等不得不受到影響。所以墨西哥今後在他工業的開發目標下，所不能忽略的是：無論是公衆或私人的各項經濟活動，在大眾生活當中，仍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也就是說，如果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僅賴一些建築或工程專家們，以他們狹小的技術和經驗範圍，而不能直接或整體的把「人文科學」與「社會結構」的知識放進他們經濟思想與活動當中，那麼無論他們的工業發展到何種程度，其社會基礎終將受到嚴重傷害。

註一：墨西哥憲法第廿七條前段規定，土地國有及限制私有土地。但原則上國家亦可將此項所有權轉讓給私人，使其成為私有財產，國家又可隨時因公共福利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為確保公共財富之更公平分配，應採取必要之方法，劃分大地產，開發小農耕地。

法律，以規定農地之最高範圍，及超額土地之分配辦法。

第廿八條規定，禁止私人獨佔事業。在墨西哥共和國內，不得有任何種類之私人獨佔事業。

註二：墨西哥幣制，一美元等於一二·五比索。

註三：工業部門籌措來的開發資金，大都是來自未分配盈利及折舊準備金，所以墨西哥所得稅法對於折舊費用有特別優待的規定。並且在國內如有新產品製造工業的興辦，一般減免課稅的規定很寬，其減免課稅的範圍可由財政部長逕行決定。

註四：自一九六〇年，墨西哥政府將教育經費列為國家總預算配額的最高位，佔總預算五分之一；一九六一年提高為百分之廿一；至一九六五年再提高為百分之廿五。

註五：墨西哥憲法規定，黨員不足三萬人者不能成為獨立政黨。共產黨、國家行動黨目前均不足三萬人，人民社會黨僅八千人，而正統革命黨人數更少。

註六：墨西哥憲法第一百卅一條第二款規定，總統經國會之授權，得增減或取消進出口關稅，並得制定新稅則。又為管理對外貿易、管理全國經濟、穩定國家生產，或為達成其他任何有利於國家之目的起見，總統如認為有必要時，得經國會授權，對貨物與商品之進出口及過境加以限制或禁止。

——上接第48頁——由於每一吋地方已被「大字報」蓋滿，「紅衛兵」改在月台地板上以徑尺大字寫着：「把譚震林免職」。

（七）棚架 四月間，共匪在廣州市若干商業中心搭起棚架，專供張貼「大字報」之用，惟內容必須經過審查後始許貼出，因此，搭棚架乃是為了控制「大字報」。（註一五）

（八）「大字報貼在大字報上」 因為「大字報」到處張貼，數以千萬計，「差不多所有牆壁的空間，可以貼大字報的都貼上了，到了貼滿的時候，就不得不重複，把新的大字報貼到舊的上面去了。」（註一六）雖然整個大陸變成大字報的海洋，但是「在城市裏，一層又一層的大字報貼在牆上足有半尺厚。」（註一七）